

贵州省地方志参考丛书

8

蟬香館使黔日記 選輯

刘泳唐 选辑

贵州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編



嚴修像

序

严修先生著《蟬香馆使黔日记》，泳唐以分类归纳、按事系日的体例整理，选辑成为一部具有参考价值的资料性著作。我认为这册选辑，包括着严修的言行、学政职责、考试制度以及制艺、科举的得失、日记的功用和性能等。既具有时代性和思想性，更富有贵州的地方特性。对研究贵州近代文化教育等方面，有一定的参考价值。特抒管见，加以论列。

严修是近代著名的教育家，在他任贵州学政时，一方面辛勤课士，一方面刻苦治学，初步更新了书院的课程。更奏请开设经济特科，主张从科举及学堂之外拔取真才。回籍后创办了私立第一中学堂，保姆讲习所，如意庵官立中学堂，又是南开大学奠基人之一。严氏奖掖后进，为当时造就了不少人才。

清代的“学政”是由吏部就翰林院、詹事府的翰、詹及从进士出身的部郎中提名，由皇帝亲自简用。其主要的职掌是：考核府、州、县的学官与考试生童。学政的品级，原为五品以下，但在任所与当地的总督、（一品官）巡抚（二品官）平行。凡有关学校与考试的事务，总督巡抚都不得侵其职权。

有清一代任贵州学政的，约有九十人次，但能培育人才，转移一代学风，为世所称者，唯乾隆时的洪亮吉、道光时的程恩泽与光绪时的严修三人而已。洪亮吉以通经学古教士，因贵州地僻，乏书籍可读，乃购经、史和《通

典》、《文选》诸书，置各府书院中，供生童阅读，从此黔士始知治经之学；程恩泽以提倡朴学为教，重刊《岳珂·五经》以训士，见遵义郑珍有异才，特优遇之，激劝之下，黔人咸知向学；严修任学政之初，以贵州难购近世的新书，即创设贵州官书局，以便学子购读。劝学子读《时务报》，以广益见闻。当时外侮日亟，国势阽危，有识人士皆知旧式书院的课程与用八股文、试帖诗取士的方法，不足以造就和拔取有用的人才，必须进行改革。

严修主张中、西学同时并课，首先于学古书院（南书院）实行，并且身体力行，与肄业诸生共同学习，互质疑难，于是学风为之丕变。清代这三位学政，对于贵州的文化、士习、文风都有很大的影响和贡献，而严修尤为突出。迄今将近百年，犹为人们所称颂。建国后，周恩来总理对严修也有高度的评价。

科举考试的试题，主要是八股文与试帖诗，谓之制艺，又谓之时文。乾隆二十二年制定，岁试：四书文一篇，经文一篇，五言八韵诗一首；科试：四书文一篇，策一道，五言八韵诗一首。以后永为定制。虽然岁、科两考，皆先合考生员经古一场，试题为经解、史论、诗、赋、算学、时务等，但生员可以各认一门报考，这场考试，听其自愿并不强制。因此，生童经古一场无异虚文。严修感到以制艺考试的方法，很难拔取真才，所以在“奏请开设经济特科摺”中，提出了以六事取士的建议。这六事是：（1）周知天下郡国利弊；（2）熟谙中外交涉事件；（3）算学律学擅绝专门；（4）格致制造能创新法；（5）堪游历之选；（6）工测绘之长。经过总理衙门及吏部的审议，曾付诸实施。他在南

书院，由于设备和师资缺乏 仅仅开了“算课”一门，就是“算课”的教师也都缺乏，为此他曾电请长沙当局代聘，但是对方却以“地瘠修薄，不愿远就”见拒。在没有教师的情况下，他只得聘裕福田来教。后来贵州学古书院的算学高材生申云藩，也为云南聘往担任教席，足见当时师资的缺乏了。

清代对“学政”一职，礼遇之崇，职掌之专，在历朝的地方学官中是比较优异的，因而学政能够在其职权之内，认真考核各府、厅、州、县所属下级学官、教授、学正、教谕、训导，並注重入学童生的奖黜与在学生员的考试，使各能敦品励学。这种颇似教育独立的制度，在专制时代是特出的。尽管“学政”的职权和教育制度，朝野如此重视，但仍然存在不少的缺点，特别是“有考无教”，不能收到作育人才的实效。正如：《经世文续编》中，孙鼎臣《论治·二》一文所说的：“督学之使，体崇而势绝，岁时集士于州郡而课试之。其于士之情不相接，虽有教人之意，无由而施。”严修了解这种缺点，因此在岁、科试时，注重面试。在南书院与诸生同研讨算课时，孜孜不倦以身教人。

由于八股文、试帖诗的取士方法，禁锢士子思想，造就了不少“村学究”、“书呆子”式的迂腐废材。或者只知猎取功名以图个人显达，于治国、治事则茫然无知，使社会事业长久得不到进步。因此科举考试遂成为人们所不满的一种制度了。光绪三十二年（公元1906年）清政府遂下诏废止。

严修的《蟬香馆使黔日记》是他一生所写日记中的一部分。至于他在翰苑时期、侍郎时期及退老时期所记的日记尚未刊行。在《使黔日记》中，每日所记，内容丰富，反映了当时的科举制度和严修对改革这一制度的情形，有感即书，见

闻必录，不作空泛之语，不为绚丽之词。从中可以看到严修治事及待人的态度了。

虽然日记富有时代性和资料性，而且记了不少有关贵州地方的珍贵资料，但毕竟日记只是起到供个人回忆的参证，是备忘录而不是传世的文章。所以在内容上有些是简略的，有些是繁琐的，还有一些生活细节及工作过程是雷同而且枯燥的。要在这些资料中进行分类归纳的整理，确是一件不容易的事。对于前人的日记用这种分类归纳、按事系日的体例来进行选辑，并无先例可供借镜，所以这是对古籍整理的大胆创新，是对古籍整理的新的探索和尝试。泳唐承担了这一任务后，他一再和我商酌篇目和体例，我认为这是属于古籍整理的范畴。古籍的整理约有以下几种：一是标点分段；二是校勘；三是根据专题将同类同性质的各书中所有的资料归纳，使之成为一种专辑或汇编。《蟬香馆使黔日记选辑》只是在这一单纯的著述中分类归纳汇辑，有似上述的第三种整理方法，但又不尽同于这一整理方法。我提出了一些帮助汇辑的意见，並嘱咐他除节删不必要的部分以外，对于具有资料价值的部分，应不厌其烦，尽量保留。不可对原作擅改一字，或擅加一词，以存真实。近一年时间，他利用工暇终于完成了这一任务。虽不十分完善，但作为研究贵州近代文化史、教育史以及地方史志的参证，还是有一定的作用。故乐为之序。

李大光 一九八六年九月二十二日于嘉禾庐

目 录

序.....	(1)
编选说明.....	(1)
南开奠基人严范孙先生.....	(6)
记考试应办事宜.....	(8)
(上编)院试.....	(11)
上游五府岁试.....	(11)
安顺府.....	(11)
兴义府.....	(14)
大定府.....	(17)
遵义府.....	(20)
贵阳府.....	(22)
下游一州七府岁试並科试.....	(25)
平越州.....	(25)
镇远府.....	(31)
石阡府.....	(39)
思南府.....	(44)
铜仁府.....	(50)
思州府.....	(56)
黎平府.....	(61)
都匀府.....	(66)

上游五府科试	(72)
贵阳府	(72)
遵义府	(76)
大定府	(81)
兴义府	(85)
安顺府	(88)
(中编) 各种生员系内之考试及治学	(92)
选拔 (平越州; 镇远府; 石阡府; 思南府; 铜仁府; 思州府; 黎平府; 都匀府; 贵阳府; 遵义府; 大定府; 兴义府; 安顺府)	… (92)
考优	(104)
录科、录遗及大收	(106)
学古书院月课	(109)
附录一: 《学古书院肄业条约》	(117)
附录二: 《雷廷珍黔学会缘起》	(120)
附录三: 《贵州通志·学校志》	(124)
奏设经济特科	(125)
附录四: 《奏请设经济专科摺》	(127)
附录五: 《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和硕亲王奕訢等奏》	… (130)
附录六: 清代的院试	(134)
治学 (1、古籍及时文; 2、地方史志; 3、训诂; 4、算学; 5、习洋 (英文; 6、自省)	… (139)
(下编) 杂志	(157)
设立官书局	(157)
贵阳各书院 (贵阳三书院; 玉屏书院; 兴义笔	

山书院；黔西文峰书院；扎佐景阳书院）……	（ 162 ）
生童及书院肄业生……………	（ 166 ）
部分生员作业……………	（ 170 ）
生童诗文评鹭……………	（ 172 ）
土特产……………	（ 177 ）
名胜（镇远镇雄关；华岩洞；飞云洞；牟珠洞；来 鹤楼；铁索桥；翠微阁）……………	（ 181 ）
气象（气象观察；时差；晴雨汇志；贵州天候统计 表；旱灾）……………	（ 184 ）
时人评鹭（外籍人士评鹭；外籍人士概述；本省人 士概述）……………	（ 209 ）
时人著述评品（本省人士评品；酬应题名）……………	（ 213 ）

編 选 说 明

—

严修著《蟾香馆使黔日记》九册，起于光绪二十年（甲午）九月十六日（公元1894年10月14日）由京启行，止于光绪二十四年（戊戌）三月初九日（公元1898年4月29日）抵京复命。1929年严氏逝世后，由其子季约、季聪以其手迹影印成书分赠亲友。

这九册日记是严氏督学贵州时期的生活、工作与治学的实录。文笔流畅，记叙严谨，富有资料性。赵元礼在序中写道：“予觉先生居心之诚恒，莅事之廉勤，从政之暇，不忘其修省与研诵，胥於所见记之”。是对这部《日记》的恰当评介。

贵州省地方志编委会副主任委员王虎文、贵州省志办公室副主任肖先治等同志都认为这部《日记》存储了许多关于贵州的珍贵的资料，如果将这部《日记》整理出来，可供研讨贵州教育史、考试史、文化史和撰写贵州地方志的参考，并将这个整理的任务委之于我。

首先我把《日记》仔细读了一遍，了解严氏此书的内容后，再以所拟义例就正於陈福桐、史继忠、杨祖恺、徐泽庶、朱文华、易舜恺诸同志。尤其是在选辑过程中得到贵州省志顾问现已八十余岁高龄的李大光先生的关切指导，定稿以后为之逐条审定。时近一年，总算完成这一任务了。

二

严修字范孙，天津人（1860—1929），进士出身。是我国近代的教育家。关于他的行谊，在本书首卷《南开奠基人严范孙先生》一文中，可以见其梗概。至於严氏督学贵州，三年来，课士子循循善诱，治学业朝夕无间，待人诚恳真挚，办事认真负责，在清代确是一个好学政。特别是注重学子的培养。对南书院生员的教学，中，殚精竭智为贵州培养出一批在学术上有相当造诣的人才。盱衡形势，对全国教育改进方面，上奏了一篇驰名全国的“奏设经济特科摺”，以后经过总理衙门会同礼部审议，付诸实施。虽然由於当时执政者的昏聩顽冥，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但也使得当时的学风有所转移。至於其个人治学精神，也足示范于后人。严氏督学贵州时，年岁仅仅是三十五至三十七岁，身居显要，不追求个人享受而对智识的追求却又无时或已，在考务繁忙，酬酢频频当中，利用公余坚持读书，先后学了古籍、报刊、代数、英文，而不固步自封，这种“身教”在当时的士子中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所以，卸任后，黔人有“二百年无此文宗”的颂联以誉之。这是贵州人士对他恰如其分的评语。

三

日记本来是供自己查考往事的备忘录，不是准备给别人阅读的。因此，在文体上没有一定的格式。所记的内容既可以记极其广泛，也可以记极其平常，总之远至世界国家大

事，近至个人起居生活和读书疑义及心得等等。内容无拘无束，无边无际，对这样内容广博的日记如何进行整理呢？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如果采取标点或者节删一些不必要的部分，那末对于提供读者只是一些零散的资料，查证使用俱不方便。为此，数次易稿试以分类归纳、按事系日的体例来进行整理。希望达到既保持作者的原貌，又方便读者的目的。

用分类归纳、按事系日的体例整理前人日记，无范例供参考，是一个大胆的新的尝试。这就使我感到尝试中不免冒昧了，但是，路是走出来的，它需要大家共同努力，去创新，去开拓，去探讨。只有这样去做，去实践，我们的整理古籍工作才会日臻完善。这又是我的希望。

严氏日记，内容充实，文笔优美，绝似一座瑰丽的楼台。现在分类归纳整理，易建为现代宅舍自然要全部拆除，而将这些材料分类置放。因此不免将一些不宜使用的余料割爱。这样的比拟是现实的，因为《日记》的用途已如前述，不像写文章而是信手拈来，各成妙谛。有时其内容如“黄河之水天上来”不悉其源，例如：南书院，算学月课，据丁酉二月二十八日记：“巳初，至南书院，山长至，行交拜礼……”。三月初一日记：“月课算学是为第一次……”。这样突如其来的记载，后人看不出南书院与学古书院的关系，也看不出月课是怎样进行而使人不解。同时某些资料，相反又似“神龙见首不见尾”，片鳞支爪，难窥全貌。如“奏设经济特科摺”一事，在《日记》中，由丁酉八月十五日至九月二十四日中，或记为“与商奏设特科”，或记为“仍拟摺章”以至“拜发奏摺”为止，仅是寥寥数语。究竟特科的内容

如何？《日记》中向未提及，这就使今人对奏摺所述茫然了。另有在考试中叙述的，何谓岁试？何谓科试？这两科考试有何异同？从《日记》中看不出来，至如“选拔”、“考优”、“录科”、“录遗”、“大收”之类的考试，从《日记》中看不出其性质和作用。而这些制度和名词，对作者来说是十分明了的，因其仅供自己查考而不是准备给别人阅读的原因，故无庸解释和说明。但在今天来进行整理，如果不酌加解释，如何能使读者了然呢？但要逐一笺注，需要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对当前修志资料的提供，时间不免稽延。因此某些问题有待读者自行参阅有关读物。

四

在整理《日记》工作中，订了如下两项选辑的准则：

一、整理范围以严氏在贵州学政任内有关考试的各项事迹为主。其由京来黔及由黔返京途中里程、游览、人事、见闻等未予收录。但对特别有关重大事项，仍然破例。如严氏由京来黔途经武陵，晤谭芝云的谈话关系后来官书局的设置，若不选入，则官书局的设立又成为“黄河之水天上来”了。

二、整理的内容，以具有资料性，可供今日研究参考为主。至如尖宿里程、夫马供应以及某些参考价值不大的资料，概从舍弃。

按以上两项定文，将整理后的日记分为上、中、下三篇，每篇之下，根据资料性质再划分章节记述。

这样拟定的整理篇目，诚然缺点很多，疵谬难免，但作

为对前人日记的整理尝试，只好如此进行，期待专家读者指正。

对前文中谈到《日记》需要注释的问题，先后又从各方面找到一些资料，列入有关篇章为附录，对原文中字迹不易辨认清楚的，则以□号代之。

另外，在《使黔日记选辑》编写过程中，得到省志办诸同志的大力支持。卢光勋同志漏夜为我校订错讹並编目，王少西同志核定气候，谨在此致以诚挚的感谢。

南开大学图书馆办公室寄给我严修先生相片及浣冰同志提供《南开奠基人严范孙先生》一文，为本辑生色不少，并在此表示谢忱。

刘泳唐 一九八六年九月十三日

南开奠基人严范孙先生

淀 冰

严范孙先生（1860—1929年）是一位爱国的教育家。曾任清末翰林院编修、贵州学政、学部侍郎等职。早在甲午战后，他就痛心外侮，主张“教育救国”，首倡设经济特科，以改革科举。戊戌以后，退官家居，立义塾、讲新学，兴办教育事业。先后在津筹办官立小学、私立小学、补习所、研究所、工艺学堂、蒙养院、幼稚园、女学、中学等多所。特别对他亲手主持创办的南开学校，尤为关心，付出了很大心血。据不完全统计，从1904年至1911年，仅捐助南开经常费、建筑费等就达三万二千余元。

辛亥革命后，袁世凯窃夺胜利果实，复辟帝制。作为袁世凯挚友，明确表示“若行兹事（指帝制）则信誓为妄语，节义为虚言”。他对袁世凯推举他为度支大臣、南北议和大臣以及授为中卿等，概不受命，始终不懈地在津推进教育事业的发展。

为了培养专门人材，1918年严范孙与张伯苓赴美考察大学教育，回国后决心共同创办南开大学。他和张伯苓等人多次奔走北京、保定、南京等地，遍访各省军政和教育当局，募集经费，终使南开大学于1919年9月成立。为了保证南大初创的必需，他带头捐书、捐地以增加图书馆藏书和兴建校舍。因此，南开大学的早期发展，与严范孙的关怀密不可

分。

严范孙先生又是一位知人、识人、爱惜异才，具有远见卓识的教育家。敬爱的周恩来同志早在南开上中学时，就被严范孙发现，并深受他的赏识。周恩来同志入学第二年，严范孙就和校长张伯苓破例为解决他的经济困难而免去学杂费和宿费。他还亲笔为周恩来同志主持的“敬业乐群会”刊物《敬业》报题写封面。周恩来同志中学毕业后，他们仍然保持密切联系。1918年，严范孙游美途经日本，刚到东京帝国饭店住下，就晤见正在日本留学的周恩来同志，并留宿长谈。

南开大学成立，周恩来同志决定入南大文科学习，开学前三天，严范孙特地请周恩来同志和张伯苓等人一起用餐。1920年，周恩来同志决定到欧洲。严范孙等人便招回当时已在香港上大学的李福景，与之结伴同行，以“范孙奖学金”给予资助。以后他们的旅欧费用，也常由严范孙按期汇寄。周恩来同志加入共产党后，有人对严讲：“听说周恩来在法国入共产党了。还供给他吗？”严范孙听说后，微微笑道：“‘人各有志’，加入共产党何害？”仍然继续资助周恩来同志。

周恩来同志对严范孙也很敬重，常写信给他。仅一九二一年见之于严范孙日记记载的就有三函。周恩来同志对严的资助也始终感怀，早在三十年代就与美国记者斯诺谈起这件事，1950年秋，周恩来同志和邓颖超同志在西华厅便宴张伯

苓、李福景等人时，又说：“我在欧洲时有人对严老先生说，不要帮助周恩来，因为他参加了共产党。老先生说‘人各有志’。他是清朝的官，能说出这种话，我对他很感激”。1959年5月28日，周总理视察南大后，晚上和一些南开老同学再次说到“严先生是封建社会的一个好人”。后来并曾向天津有关同志问起天津人民图书馆收藏严范孙日记的情况，提出要叫后人研究范孙思想的发展。

1983年4月《南开校友通讯》复刊第3期

记考试应办事宜

到棚前一日：检点所收與呈。问府城各官行号。备送戈什哈等赏钱。

到棚日：见提调严示不得听家人夤索。见教官严属举优以品行为主，见教官属慎择廩保。见教官催早送册卷。检点书籍。出牌示谒庙放告、考古及生正场日期。札府学送书